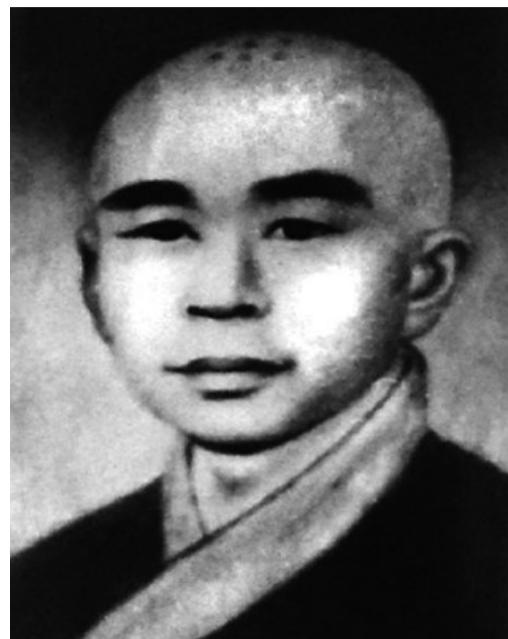


寂然、志开:日寇屠刀下 无惧救难民

□晓宇



寂然像



志开像



南京栖霞寺为寂然法师塑铜像于栖霞山绿茵丛中



寂然法师(1900—1939)，江苏如东人，俗姓严。1909年受具足戒于镇江宝华山，剃定于镇江江天禅寺大彻堂，后到南京栖霞寺，曾任监院。

志开法师(1910—1980)，江苏海安人，俗姓王，名志林。12岁到苏南白塔山大觉寺出家为僧。1934年进入焦山佛学院研究佛学理论，1936年应邀到栖霞寺。抗日战争胜利后曾任栖霞寺住持。1956年回海安务农。在“文革”中病故。

1937年底，日本侵略军攻陷南京，制造了震惊世界、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许多南京市民为躲避日本侵略军的追杀，逃到南京城外的栖霞山地区。目睹大批遇难百姓流离失所，露宿栖霞山坳，饥寒交迫，志开法师和大本法师一起向栖霞寺当家和尚明常(江苏如皋人)、寂然力陈救助事宜，商

定在栖霞寺建立“栖霞山难民收容所”，竭尽全力收容难民。

收容难民期间，日军多次袭扰栖霞寺，肆意杀害儿童、强奸妇女。为了阻止日军对栖霞寺的侵扰、保护难民，寂然法师书写抗议书，通过丹麦工程师辛德贝格转交给约翰·拉贝先生，并翻译成英语递交日本大使。寂然法师抗议书的题目是《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后被记录于《拉贝日记》里。

栖霞寺的僧人原先一日三餐，为了救济更多的难民，寺院决定僧人一日两餐。寂然法师说：日食两餐，补济饥饿，救难民生命为第一修行大要。2003年栖霞寺出土的“寂然上人碑”碑文记载：“民国二十六年七月芦沟事起，烽火弥漫，旋及沪京，载道流亡，惨不忍睹。上人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襄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获救者二万三千余人(后有两万四千余人一说)，日供两餐，时逾四月……”因救助难民积劳成疾，寂然法师于1939年10月圆寂。

志开法师时任“栖霞山难民收容所”总务，负责难民的生活安排。可以想象，在当年战火纷飞、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要解决两万多名难民的食宿问题，难度很大。但明常、寂然、大本、志开法师率众僧耗尽寺院所有积蓄，并四处奔走求助，坚持了四个月之久，直至收容所关闭。

在收容难民期间，志开法师获悉时任国民政府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中校参谋主任廖耀湘及百余名官兵被困栖霞山坳，立即设法在当地居民中筹集便衣，用小船秘密将他们送达长江北岸，脱离了虎口。抗战胜利之后，廖耀湘特地到栖霞寺进香还愿，并以亲笔书写的“栖霞古寺”匾额相赠，感谢栖霞寺僧众的救命之恩。而志开法师因救助难民有功，后升任栖霞寺住持。

2005年，在台湾佛光山开山宗长、国际佛光会世界总会总会长星云大师和栖霞寺传真法师力主和资助下，南京三藏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南京精汇科技文化有限公司将此事件改编成电影《栖霞寺1937》，使栖霞寺一

众僧人的义举广为传颂，寂然、志开等法师被誉为中国的“辛德勒”。

星云大师与志开法师还有一段师徒渊源。1938年，扬州少年李国深随母亲至南京寻父，于栖霞寺礼志开法师剃度出家，后成为名扬四海的星云大师。星云曾著文深情回忆志开法师当年对自己的教诲。他在文章中说：“有一次，志开上人难得开口问我近况如何，我说：衣单不周，纸笔不舍。他当即对我说，你以为没钱向我诉说，我就会给你？我把茶钱省下来给你花，你也用不完，但我不能给你。什么原因你现在不懂，将来你会明白。正是师傅的不给我养成不要的品格。这让我受益终身。”

1989年，星云大师回大陆，专程到海安白甸将师父志开的遗体起棺火化，将骨灰分成四份，分别在法师故土、南京栖霞寺、台湾佛光山、美国西来寺立碑安葬。星云大师并以师父志开法师的名义，捐款10万元人民币给海安教育部门，设立了志开教育奖学金。



江海风物

百捞菜

□朱惠忠

现在上饭馆小酌，大家提倡“光盘行动”。大些的酒宴，剩菜也已习惯打包。这令我想起了过去的“百捞菜”。

在生活贫困的年代，尤其是在爷爷奶奶那一辈，人们请客都很简单。我依稀记得，那时请客只有“四盆六碗”，所谓四盆是指冷菜，都用香肠、皮蛋、花生米等充主角，装冷菜的盆子是一种特别小的青花瓷盘，口径的大小如乡间常用的蓝边碗那么大(我家至今还藏有这种盘子)。六碗就相当于现在的热炒，用的是蓝边大碗，端上台都是热乎乎的。其中一道“箍蟹肉”，一道“狮子头垫青菜”是当时的厨师最为拿手的，再配上“蛋饺子”“油豆腐嵌肉”之类的东西，大半桌菜肴就张罗成了。到了我的父母辈，就有了“八冷八热”“全鸡全鸭”的名堂，此时除了盛汤用特大号的汤碗，其余全用盘子，盘子的直径比先前大了一倍。冷盘热盘均变成了八只，不消说品种自然是丰富了许多。那时的热炒不像现在那么干巴巴的，每道炒菜都有辅料加入。尤其是韭芽山药片，可谓炒菜的百搭，无论是炒肉片、炒鱼块、炒腰花，与之一经搭配，味道便格外鲜美。厨师也总是迎合食客的胃口，每道炒菜均盛有盈盈的汤汁，那个鲜，喝上一汤匙满肚子舒坦的。

过去乡间请客，用的是方台，每桌八人。在这种场合，小孩子一般不去占座，客人们陆续到齐以后，主人家招呼大家入座，一群孩子继续在外面尽情地玩耍。这是大人们事先叮嘱好的，说是考虑到主人家可能估计不足，免得座位不够而尴尬。因为那时限于经济条件，人们请客大都点卯入座，小孩的位置一般不考虑在内。待大人们酒足饭饱以后，才挑些菜，让一群“孩子们”在旁边的小桌上胡乱地吃一通。

那时酒席上的剩菜是舍不得倒掉的，席散以后，主人家会搬出脸盆之类的家伙，把桌上“弃之可惜”的剩菜不管荤素统统集中拢来，待第二天一锅煮，称之为“百捞菜”，再将灶间里煮菜剩下的“零头剩脑”随意地加工几个，供全家人和留宿的亲戚一起海吃一顿。这“百捞菜”，大概因为成分多的缘故，看似“连汤带水”，味道却特别鲜美，不比正规的炒菜差多少，倘若是在冬天，还能连续吃上几天呢。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那年冬天，小姨出嫁，因学校离外婆家不远，我时时念着那些剩菜，一放学就径直往外婆家跑，直到残羹冷炙找不出为止。外婆打趣地说：“真是一只馋猫，赶都赶不走。”

现在人们生活富裕了，请客排场越做越大，桌上的菜肴堆得像小山似的。曾经让人垂涎过的鱼肉之类的东西，已不再稀罕了，即使是先前被人们称之为名菜的甲鱼鳗鲡，也已归属为“小菜一碟”，“大龙虾”一座、“花蛇肉”一盘，才显得有派头。总而言之，这种现象与政府倡导的光盘行动，是格格不入的。富裕了，难道就不能悠着点么？

赤脚医生与散装药片

□程太和

赤脚医生是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的名词，指农村没有固定编制、一般经乡村或基层政府批准和指派的、有一定医疗知识和能力的医护人员。他们接受当地乡镇(公社)卫生院直接领导和医护指导，在农村一线为农民群众服务。他们的特点是：亦农亦医，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行医，故称为“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出现，解决和缓解了我国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问题，在广大农村地区普及爱国卫生知识、卫生防疫、除“四害”、根治血吸虫病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还记得，当我们村(大队)共有11个生产队，1000多人口，村卫生室(诊所)有3名医生，其中，1名医生是公社卫生院下派的编制人员，2名医生是赤脚医生。老百姓都尊称他们为“先生”。赤脚医生中医、西医都来得，把脉、看舌苔、听诊器听诊，随后就根据患者病情，从药架上拿下玻璃药瓶，在桌子上摊开一张15厘米左右见方的小白纸，倒出十片八片的药片，用纸包好，嘱咐患者如何服用。通常吃上两三天，感冒或肚子疼的病就好了，此时药片也差不多吃完了，没有一点浪费，实用又实惠。我们小孩吃的驱蛔虫的宝塔糖、维生素，也是这种方法。这些药片、糖丸都是散装的。赤脚医生在村里还兼种植中草药。中草药的种植、栽培、收割、晾晒、加工，都是他们亲手做的。那时，老百姓收入低，但看病也很便宜，到大队卫生室看病每次5分(一张5分钱的处方笺)，门诊费、药费都包含在里边。赤脚医生还上门为患者看病，叫出诊。出诊费用稍贵点，每次1角钱。

征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南通的民营报纸《通海新报》

□王士明



《通海新报》在南通报业史上，是一份较有影响的民营报纸，创刊于1913年3月18日，终刊于1929年5月。在16年的历史中，一直拥有较多的读者。该报为双日刊，是南通的第一张对开铅印大报。先由南通翰墨林印书局承印，后自办通新印刷公司印刷。由于报纸的创办人陈葆初、林仲希、刘乙青、张佐虞四人中，陈葆初、林仲希为南通人，而刘乙青、张佐虞则为海门人，故该报定名为《通海新报》。《通海新报》报头“通海新报”四字楷书竖排为张謇所题，主编为刘伟，社址设在南通城内寺街。报纸辟有社论、命令、要闻、本地新闻及杂著、告白等栏目和专版，编排和内容有别于当地其他报纸。

《通海新报》主办人陈葆初(曾一度担任过两淮盐运使之职)虽为地方绅

士，但对舞文弄墨之道却不太精熟，故对报纸亦很少过问。报馆中大多为清末旧知识分子半新派人物，得以自由施展笔头，以浅显之笔，述朴实之理，记紧要之事。办出了“直言无讳、有闻必录”的特色，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13年至1929年，正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开阖、世事不变、大事纷呈、变故迭起的时期。《通海新报》对发生于这一时期的大事、事件都比较客观地作了报道。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消息传来南通，《通海新报》站在学生爱国运动一边，随即报道了该运动发展的消息，并发表了支持学生的评论。第一篇评论《人心未死》，为学生焚毁曹汝霖住宅，痛殴章宗祥欢呼“快哉”。接着在报纸显著地位刊登南通青年对日本帝国主义表示极大愤怒的投函。南通城北小学学生要求联合向商会请愿，劝商界抵制日货，该报带头发表声明，支持学生正义行

动，并停载日商日货广告。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两天后，《通海新报》即引用沪上各报所载的消息予以详细的报道。“南通学生上海五卅血案后援会”成立后，又及时发表“后援会”历次会议记录，支持“后援会”检查销毁日货等进步活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亦称“大革命”时期，该报及时报道了北伐军胜利进军及各地群众支援北伐战争的真实情形。该报所有这些举动都得到了读者的好评，在南通报坛上是一份不可多得的报纸。

1917年后，陈葆初等人去了上海，报馆工作由陈葆初的内亲葛松亭等人负责，葛对报纸过问很少。1925年，进步青年、共产党人丁璜、刘瑞龙通过关系，设法进入《通海新报》报馆，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并在报纸上发表了多篇针砭时弊的文章，如《悲壮可念的五月》《今年的纪念五四》《五·四纪念与国民革命》等多篇评论。起到了很好的宣传

作用，为报纸注入了活力和生机，受到诸多读者的欢迎。作为近代地方性民营报纸，亦为启迪民智、维护民权和锻造国家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8年冬天至次年春天，由于《通海新报》不留情面，据实披露了国民党南

通当局某人对平民敲诈勒索的丑恶行

径，国民党江苏省苏政部下令对《通海新报》予以查封。1929年5月26日，国民党南通县公安局局长率领武装军警气势汹汹地冲进报馆，四处搜查，捣毁报馆内的各种物件，弄得一片狼藉，报馆人员噤若寒蝉，无人敢于反抗。自此，办了16年之久的《通海新报》报纸黯然停刊，在南通报业史上留下了沉重的一页。

《通海新报》合订本在南通市图书馆有藏。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笔者参与编史修志工作时，曾多次前往市图书馆查阅各种地方史料，数次查阅过该合订本，获得不少宝贵资料。

如城“顺记”理发店

□何泰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如城“顺记”理发店是一家很有名的理发店，店主李少庭系如皋东北乡李堡(李堡旧属如皋县管辖)人。因其父亲李顺根曾在李堡街上开设“顺记”理发店，故李少庭在如城开店，仍以“顺记”冠名。

“顺记”理发店位于如城最热闹的鱼市口地段。初期，由如皋南门城外一个绰号叫“明鹅头”的人出钱相助，买下大治巷内“吉如理发店”的资产，在鱼市口重新挂牌设店，初始是名义上的股东店，后来实际上资产全转给李姓所有。“顺记”店堂面积50多平方米，正常雇佣七八名理发师，多的时候十二三名，这在当时的如皋城是一个比较大的理发店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李少庭又在海安城隍庙南巷开设了“顺记”分店，该店经营了一段时间后，转给海安的王有德。抗战胜利后，李少庭经常

弯曲，其余工艺跟汽烫相似。无论是采用哪一种方法，烫发型的技艺要求都非常高，既要让人看在眼里有绒质感，又要立体感。烫发用的药水一开始是自制的，后来是从上海购进的。自制药水，主要原料有硫酸磷、碳酸钾、阿摩尼亞、甘油、火矾等。配方有严格的比例，理发店里能配制药水的理发师寥寥可数。火钳烫发是男宾较多使用的一种造型方法，一般理发师傅都能用它做出简单的发型。吹风机是理发店的必备工具。解放前，如城白天无电源，只好用火油或木炭吹风机。火油吹风机由油箱、灯头、喷嘴、风轮和发条组成。火油吹风机给顾客吹头约需20分钟，定型效果好，但头发上会残留火油味。木炭吹风机高度约1米，用白铁皮冷冻而成。由木炭箱、弯颈、拔风管、喷嘴组成。使用时木炭箱内放进燃烧的木炭或煤球，发出呼呼的拔风声，通过喷嘴喷出热能，使头发定型。“顺记”理发店还有一些附加服务，如捶背、推拿、抹筋、搬落枕、接脱臼、治腰痛、治肩痛、治静脉曲张、治疗疼痛、治中耳炎等。

炎、治沙眼，摄取进入眼、耳、鼻中的异物等。这些附加服务，一般不收取费用，但以此可固化“顺记”顾客。“顺记”店主李少庭在如城理发业曾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曾担任理发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一职。如皋理发业同业公会会馆设于如城北门余桥西河边。每年农历七月十三全行业举行一次集会，称为“香期”。事前，李少庭等根据各理发店的规模、等级收取会费，筹集“香期”活动所需资金，然后，委托专人购买香烛、水果、茶食、糕点、菜肴、米酒等物。会期这一天，全城的理发业从业人员聚集在会馆里。白天祭祀理发业祖师爷(罗祖)和本地本行业已故前辈，并为之升牌位以示尊敬和纪念。午间，所有与会者聚餐饮酒，气氛活跃而隆重。事后，由主持人“刷黄”公布经费收支账目。“香期”活动虽然带有一定的封建迷信色彩，但却有助于各家理发店之间和理发师傅之间相互联系，增进行业内的友谊和团结。而“香期”主持人也借此活动树立威信，有利于处理本行业的纠纷和有关事务。